

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生动讲述中国故事

——陈毅达长篇小说《海边春秋》研讨会综述

3月3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海边春秋》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纪秀荣、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林彬、《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何镇邦、曾镇南、胡平、张陵、贺绍俊、白烨、徐坤、王干、张柠、吴子林、刘琼、胡友笋、岳雯、刘汀等20余位作家、评论家及福建省第二批赴平潭挂职干部领队、援岚代表陆永建参加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主持。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从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了热烈讨论,充分肯定了《海边春秋》是一部书写新时代的现实力作,是一部应伟大时代之命创作、反映伟大时代精神、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表示,《海边春秋》是《人民文学》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北京名校毕业回闽工作不久的文学博士刘书雷,被派往距离海峽对岸最近的开发热土岚岛挂职,进入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实熔炉,从好奇、热情、不懂、慌乱,再到倾听、观察、分析、判断,直至扎扎实实地与生活土地上的人心、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他遭遇了复杂而繁多、具体又紧要的疑难事项,也从实践中磨砺出了面对问题的辨别力、解决问题的穿透力。作品通过兰波国际项目与蓝港村整体搬迁的矛盾与破解展开叙事,并没有回避开发商与村民的本位主义、干部中存在的决策简单和作为不力等现象。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大的战略背景下,作品深深深入了岛上村民生活生动的细部:有着传统人格风骨的大依公,有着现代化知识和素养的“海上蓝影”新青年群体以及善于思考的本地干部、岛上人从“空”到“返”的奇景等等,这一切共同描绘出了新时代现实里“可能的生活”与人生成长的斑斓画卷,也让刘书雷由嫩书生到实干家的心性转变更加真实可信。新时代现实题材书写,是对作家能否保有新鲜的思想敏锐性、能否具备足够的创作完成度、能否秉持初心并在对时代生活的真切体验中生成无尽创造力的考验。因此也可以说,新时代,检验着我们作家的认知水准、行动

能力和综合素质。在此看来,陈毅达完成的非常出色。

原鲁迅文学院教授何镇邦认为这是一部着重表现新时代、新人物,有时代气息的力作。《海边春秋》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作为新时代文学新人代表刘书雷的形象。刘书雷生于长于闽北农村,当他在北京名校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在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领域崭露头角之时,为了深入基层,回到闽省文联担任作协副秘书长,旋即被派到省援岚办,并被援岚办派到因拆迁矛盾激化的蓝港村工作。他与岚岛实验区党工委下派到蓝港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张正海紧密配合,深入调研,依靠群众,争取领导,在不长的时间里扭转了蓝港村工作的被动局面。在岚岛实验区党工委和省援岚办的领导和支持下,他们顺应民意,改变了蓝港村的拆迁计划,与兰波国际重新协调开发银滩的计划,制定与落实了蓝港村的发展计划。令人瞩目的不仅仅是一个在书斋里成长的文学博士在改革的大潮中锻炼成长为改革大业的干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的政治品格。带着四瓶“福茅”去闯大依公的家门尽显其豪气,救助虾米一家的义举更能看出他心中的大爱,书写他同“海上蓝影”微信群中蓝港村外出年轻人交朋友这一笔更显时代色彩。应该说,刘书雷这个形象是新鲜的,具有时代色彩的,如能更深刻地揭示他的内心世界,写写他的情感波澜,那么,他的艺术形象将更立体、丰满。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认为,这部主旋律作品直接反映新时代新气象,重点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平潭综合试验区的建设。《海边春秋》的主人公设计得很有意思,刘书雷是个学中文的文科博士,在文联工作,平时写点东西,属于小公务员,不介入实际工作。但由于他在省级机关工作,上面要求援岚的干部必须是博士以上,就把他派去了,其实他本来没有报名,不是党员,连参加村委员会有没有资格都成问题。这样一个文人,到基层能起什么作用呢?这种反差构成作品的一个人悬念,容易抓住读者。他最后完成了扶贫攻坚克难,解决了大问题,反过来想又有根据,根据之一就是他的文人气质。他写过一篇散文,谈中国古代文人的胸怀和抱负,文联领导考虑派他去,和见到过他这

篇文章有关。他有书生的正派,办公公道,能真心为百姓着想,所有这些都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作品的悬念。陈毅达在小说里加入了几种地域元素,组合在内容里,活跃了作品的氛围,它们包括石厝、摩尼光佛、“海上蓝影”等,引人注目,对故事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关于村里人抵制拆迁时为何那么齐心,书里也有合理的解释:渔村有个传统,海上刮起台风时,住在小厝里的村民就会带上生活用品搬到大理石厝里的人家避风,家家户户都不会拒绝,只会热情接待,有困难互相帮,所以渔民们历来齐心。作者把这些有趣的元素夹杂在作品里,展示了另一种天地,使作品地方色彩浓郁,新鲜好读。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认为这部作品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当中卓具新意的力作。在人们热切期盼反映改革开放生活的力作之时,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适时问世。阅读这部作品,不仅火热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而且刚劲的时代新人迎面走来,这使这部作品在当下的现实题材书写中,以其别具一格的韵味和卓具新意的意蕴而格外引人瞩目。岚岛作为综合试验区的开发建设,本身就是沿海地区深化改革开放的集中体现,而以援岚干部刘书雷、第一书记张正海为代表的一线干部,在原有的开发计划面临蓝港村搬迁受阻的巨大难题时,既从改革大局出发,又倾听群众心声,最终以不搬迁的升级改造方式的建议,说服了方方面面,使得岚岛的经济开发得以继续进行,又顺应了蓝港村民的普遍意愿。这样的事实求是的做法,背后体现的是尊重民意、顺应民心的思路,可以说这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的最好践行。以岚岛的开放建设为舞台,作者由矛盾冲突的认识与解决,改革路向的寻索与抉择,塑造了一群满含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其中尤以刘书雷最为典型。刘书雷在援岚过程中,一步步地走向改革前沿,也一步步地走向矛盾深处。善于动脑、勤于思索,使他始终保持了应有的理性;走近群众,倾听民意,使他深入了解民情、岛情。由此,他不仅在身份上实现了从机关务虚到基础务实的转换,而且在情感上实现了由听从指令到倾听民意的转变,这使这个本来并不起眼的“博士”干部,很快成长为岚岛开发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现实干将。除去刘书雷之外,本

地姑娘海妹、回乡青年赵晓阳等,在积极关注岚岛动向的过程中,顺应改革开放的趋势与需要,把个人的事业追求与家乡的改颜换貌结合起来,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当代青年的高远理想与实干精神。这也向人们充分表明:新时代涌现新人物,新人物引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不能没有灵魂》的讲话中,期望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正是向着这样的方向积极进取,并取得显著成绩的最新成果。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雯认为,陈毅达的《海边春秋》以文学博士刘书雷援岚岛建设为主要表现内容,充分传达了作者对于文学博士这一知识分子的善意。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一洗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尊敬。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博士,特别是文学博士,往往是被嘲笑或讽刺的对象,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海边春秋》重新倡导知识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刘书雷之所以能打破蓝港村整体搬迁的僵局,固然得益于他的学习能力与探索精神——他不断打破固有的认知体系,建设新的认知框架,并付诸实践,而新的认知框架是解决危机的必然途径,而岚岛上上下下对于博士的接纳与欢迎,也是刘书雷得以有效地开展工作的重要契机。当然,对于一个博士来说,对于社会这本大书的学习是更为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海边春秋》是一部有关“发展”的小说。一个具备了学习能力的年轻人,投身到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增长见识、锻炼本领、从而获得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办法,成长为一个具有社会经验,同时不失理想与抱负的“新人”,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而与之相伴的,是一个古老的渐趋空心化的乡村,重新吸引年轻人回到其怀抱,从而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两者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甚至互为隐喻。刘书雷进入蓝港村开展工作,正是村庄与青年共同发展的过程。小说在想象古老乡村在新时代发展的路径的同时,也为个人的成长创造了空间。

陆永建作为福建省第二批赴平潭挂职干部领队、平潭文联主席、援岚代表,对平潭地区的



了解更加深刻。他认为,平潭综合实验区既是对台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海峡两岸“共同家园”“一岛两窗三区”和自贸区建设是国家战略,综合实验区在中国仅此一个,具有对台深度融合的特殊使命。所以,这里的干部挂职不等同于一般的基层锻炼,不是支援地方建设,而是高起点、高要求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陆永健有幸作为福建省第二批挂职干部领队,带领560名干部在平潭挂职3年。立足于平潭的战略定位和发展使命,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活动,先后出版了12本书,留下了3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为陈毅达提供了很好的创作源泉。

在陆永健看来,刘书雷作为小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其实是19名平潭挂职博士的一个综合体,是时代精神的凝聚体现;而关于小说中描写的蓝港村,其原型就是平潭的北港村,在开发开放中涌现出许多新事物新气象,小说里出现的很多人物、事件都是鲜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平潭原来是个孤岛,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正是综合实验区的伟大战略赋予了它生机和活力,建设成一座时代新城。作者正是带着深刻而前瞻的眼光,发现平潭独特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纷繁的生活万象中提炼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发出正能量,发出时代之声,才让小说具有如此动人的精神力量。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顾坚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元红》《青果》《情窠开》陆续问世以来,好评如潮。特别是其处女作《元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横空出世,一版再版,至今仍拥趸甚众。其时,顾坚身份还只是扬州街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服装批零商,一个地地道道的来自里下河水乡的农村青年。没有经过专业文学训练,对文化热点和文学动态也知之甚少,却能够如野花野草般绽放于文坛,堪称农民原生态写作的一个奇迹。

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优秀作品却寥寥无几。《元红》不一样。也许相悖于传统叙事的金科玉律,也许难套上文学理论的条条框框,顾坚《元红》给文坛带来的清新、惊喜和冲击力,依然是稀缺的、始料不及的,因而是弥足珍贵的。《元红》为什么这样红?点赞者如云,疑惑者有之,评论者也众说纷纭。我认为,《元红》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它粗粝而浪漫的青春叙事。

《元红》的文本粗粝而浪漫,文本独创,原汁原味。自五四以降,“青春叙事”都与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同步。青春总会逝去,但文学却可以永远处于“青春”的行走状态。相对于一些与中外经典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小说,我更固执地欣赏顾坚小说的自我倾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元红》的青春叙事原始、率真、粗粝、混沌、独树一帜、独具匠心,似乎无迹可寻。它既不同于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病态青春”,也不同于杨沫的《青春之歌》、王蒙的《青春万岁》中的“革命青春”,更不同于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的“苦难青春”。比照同类青春题材,《元红》堪称阳光、阳刚的“活力青春”,朴素本色、天真无邪、激情四射、充满活力。

有一种体验刻骨铭心,有一种感受惊心动魄,有一段经历令人热血沸腾,那便是青春。初读《元红》,感觉比较粗糙。在结构、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似乎不够周密,不够精致,也不够完美;仔细琢磨,突然眼睛一亮。内在的结构逻辑、流畅的语言节奏和强大的叙事气场,都令人赞叹。尤其是叙事如行云流水,大胆而温婉,干净而唯美。青春少年的纯美爱情、热血青年的奋斗激情、成功男人的美满婚姻,栩栩如生地跳跃在字里行间,始终氤氲着粗粝而浪漫的青春荷尔蒙与里下河风情。《元红》好像一株根植于民间沃土上的奇树,在布满阳光、河流、湿气、森林、飞鸟与荷尔蒙的里下河乡村野蛮生长。翻开《元红》,就好像打开一个魔瓶,那个叫青春的流传至今的古老瓶子,风起云涌般地释放着内部空间随着时间流逝逐渐积聚的青春魔力。在这里,我们能读懂青春。青春朝气蓬勃,青春血脉偾张,读来令人畅快淋漓。

莫言称赞《元红》为“被淡淡的忧伤情绪笼罩着的、带有自传色彩的怀旧小说”,颇有道理。而

顾坚《元红》:粗粝而浪漫的青春叙事

□孙建国



我更觉得,《元红》固然有自传色彩,但绝不是自传;《元红》固然叙述了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主人公丁存扣9岁到35岁的人生历程,但也不仅仅是怀旧。顾坚在“后记”中也坦承“无可避免地会掺杂很多的个人经验和私人成分”。写作《元红》,也是对他逝去岁月的浪漫祭奠,满足了对于生活中诸多情结和感慨的集中诉说,让他重新审视和体味早已淡远和湮没的生命细节。

文如其人。现实生活中的顾坚,豪爽与柔情并重,野性与敦厚齐飞,潇潇洒洒,自由自在,对人、对事、对物、对文学,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定视阈和生命感悟。有人说他有点“另类”,殊不知,“另类”则意味着远离惯性思维,意味着热衷创新创造。然而不管人们怎么说,顾坚犹如一匹野马,裹挟乡野之风,喷薄阳刚之气,已经狂野地闯入了文坛。解读《元红》,也应知人论世。譬如书名《元红》,饱受非议。仅从字面理解,似乎难免落入俗套。元红,即处女在初夜时所流的鲜血,颇有“标题党”之嫌。其实,“元红”的含义显然不止于此,还有更广泛的社会学、文化学和青春叙事的特殊意义。“元”者,开头、首次、原始、庞大之谓也。“元红”,何尝不是“活力青春”的象征?何尝不是“美好生命”的隐喻?又何尝不是“顾坚小

说”的标签?如此说来,《元红》就是《元红》:因“元”而“红”,无“元”不“红”,惟“元”才“红”。

《元红》的形象粗粝而浪漫,一颦一笑,个性鲜明。主人公存扣和他的五个女人庆芸、秀平、阿香、爱香和春妮,都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灰头土脸,却个个生得标致;没心没肺,却个个一往情深。作者妙笔生花,每一个人物都勾勒得活灵活现。用明代学者叶昼点评《水浒传》的话说,“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毫不差,读去自有分辨。”存扣温柔敦厚,他只是卑微到尘埃里的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因为勤奋好学,长得也英俊,居然受到五个女子的青睐。五朵金花,姹紫嫣红。庆芸的温柔、秀平的温婉、阿香的妩媚、爱香的娇憨、春妮的温良,就好像5月的软风吹得一朵朵好花盛开。她们不约而同地向少年存扣投去深情回眸,微微一笑很倾城,甚至于不惜用元红来祭奠最初的爱恋。青春的狂欢来之不易,存扣格外珍惜男女恋爱。懵懵懂懂、跌跌撞撞、笨手笨脚,却没有传统叙事中好色之徒的放荡和粗暴。例如,他暗恋秀平,却羞于启齿,只能将情诗写在田野中的油菜叶子上。对于女性,他永远是被动的,却是极其认真的、虔诚的、严肃的。他的爱情唾手可得,却一波

三折,好事多磨。当庆芸爱上存扣,却提前上了卫校;当秀平走进存扣生活,却早早死于白血病;当阿香成为秀平的替补,却被迫委身于糟蹋自己的张厂长;当存扣高考失利心灰意冷之际,即将成为新娘的爱香却主动投怀送抱;存扣大学读书期间,与春妮相亲相爱,步入婚姻殿堂,却时时思念那些远飞的大雁……存扣就在这生活的漩涡中挣扎着、努力着,并在挣扎与努力中,与这五个女子肌肤相亲、悲欢离合、缠缠绵绵、寻寻觅觅。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到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从兢兢业业的乡村教师到意气风发的成功商人,存扣成长起来了,成熟起来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元红》中,作为怀旧对象的青春,并没有定性为一种纯粹的、生物性的青春。虽然全书性描写俯拾皆是,混然天成,坦率得近乎天真。但身体本身成了元叙事之后,身体之外的元叙事则水到渠成地自行蔓延,诸如残酷现实与人生追寻、青春怀旧与成长之痛、人性诡谲与美妙青春,等等。显而易见,《元红》的青春叙事,高举的是欲望旗帜,承载的却是寻找与迷失、信任与误解、希望与幻灭、脆弱与坚强、逃离与回归等一系列青春不能承受之重。如果从审美的伦理悖论角度来进行观照,《元红》是在对欲望的张扬和描述中,展现了那个特定年份青年人在时代潮流裹挟中的孤寂苦痛、失落悲哀以及上下求索、生生不息的心路历程。

《元红》的表达粗粝而浪漫,人情物理,逼真传神。描摹写照的生活场景和艺术氛围,依照故乡模样还原建构了一个令人着迷的文学地理空间。故乡既是他生命的起始,又是他创作的源泉。离开了故乡,他的灵魂就无所归依,创作的源泉就会枯竭。《元红》的创作,无疑是顾坚一次致敬青春的精神还乡。

顾坚从兴化农村走向古城扬州,投身于商海,一干就是12年。他说过,选择写《元红》,用文字把故乡定格在长篇小说中,使她成为许多人心中美丽、抒情和感伤的意象。与一些长篇小说扉页献词献给某某个人不同,《元红》扉页献词为“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故乡”,也是出于作者对故乡热爱和感恩的赤子情怀。游子的殷殷之情、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元红》中,主人公存扣从顾庄出发,走过吴窑、田垛、石桥,乃至兴化、扬州、盐城,从懵懂无知的孩童,情窦初开的少年,意气风发的青年,直到为爱情弃教经商的中年……在他鲜活的青春生命中,既有奋发向上的风雨兼程,又有儿女情长的扑朔迷离。

故乡也是粗粝的,贫穷、闭塞,甚至愚昧,但故乡又是浪漫而多情的。兴化乃处于里下河腹地,兼融吴楚越之韵,汇聚江淮海之风,历史悠

久,风光旖旎。在顾坚笔下,河流之中,垛田之上,自然风景似童话般绚丽,乡民品性如儿童般纯真,风土人情像千年槐树般古朴。那里的男人,憨厚中见狡黠;那里的女人,泼辣中见刚烈;那里的儿童,顽皮中见天真。男欢女爱,你依我依,如春天开遍广袤田野的油菜花一样疯长。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生活色调,斑斓多彩,皆浸染并泼墨于《元红》之中。晚上搂着难得回家的妈妈睡觉,“生怕妈飞了似的”;童年生活中的狗尾草,用一泡尿冲蚂蚁、看鸬鹚在水中叼鱼;夏夜偷看漂亮女人;“仰躺在浅沼泽里,只把那根尿尿的东西露在外面,在阳光下胡思乱想”……天人合一,天真烂漫,英俊少年存扣就在这种乡野的纯净与暧昧中慢慢长大。

往事如歌,且吟且行。没有精致而有序的旋律,只听得远处传来杂乱无章的粗粝而浪漫的乡野交响曲。一个孩子生在性方面从懵懂到灵透开窍甚至向往和摹仿的故事,在乡野交响曲背景音乐中,被顾坚讲述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不仅如此,《元红》的艺术构思清新自然、朗澈见底。丁存扣和五个女子情感分合的婉转曲折,犹如里下河地区的河湖湾汊,曲曲弯弯、分分合合,充满了矛盾疏解、聚合和好、遭遇毁灭、隐忍而破灭的起伏过程。这也是《元红》的艺术质地高人一筹之处。

全书结尾,当存扣以一个成功商人身份再度回到那一片乡村土地时,既有往事只能回味的沧桑感,又有往事并不如烟的迷茫感,更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自豪感。那条曾经忘情嬉戏的河流已经污浊不堪,那些曾经肠柔寸断的往事也已随风飘逝。而那个爱香16年前为他生下的叫亮存的孩子也让他唏嘘不已,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新一代茁壮成长更使他欣喜若狂。模糊而生疏的故乡也因此清晰起来,从此挥之不去。年轻时不懂爱,懂爱时已不年轻,丁存扣不禁潸然泪下。所谓怀旧和忧伤,实质上是感受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蕴涵着对已经消逝的美好青春、活力青春的眷恋与呼唤。

这样的大结局,体现出作家以回忆的姿态在审视自我时,对时间、事件、生命、人性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元红》告诉我们,青春是未来在地平线上露出朦朦胧胧的轮廓,但现实的狂风暴雨却使年轻的生命之舟风雨飘摇。丁存扣们像海鸥一样顽强地搏击着,在漫长的、甜美的、苦痛的挣扎中,脱茧化蝶,脱胎换骨,成长为一名勇敢的水手,终于抵达希望的彼岸。阳光总在风雨后,青春依然是斑斓的、璀璨的、明媚的、粗粝而浪漫的。这便构成了《元红》青春叙事的主要元素和独特意象。